

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

钱锡生摇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摇摇录

序

杨海明摇员

导摇论

员

第一章摇唐宋词的传播背景和传播阶段

远

摇第一节摇唐宋词的传播背景

远

一、城市化为唐宋词的欣赏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

远

二、商业化为唐宋词的消费提供了适宜的温床

源

三、“去道德化”为唐宋词的创作摆脱了精神的束缚

苑

摇第二节摇唐宋词的传播阶段

园

一、“乐人之词”以声音传播为主

园

二、“诗人之词”以文字传播为主

源

三、“词人之词”以印刷传播为主

苑

第二章摇唐宋词的歌舞传播

猿

摇第一节摇唐宋词歌舞传播的主要场所

猿

一、宫廷宴席歌舞

猿

二、公私宴席歌舞

源

三、酒楼茶馆歌舞

源

四、街市瓦肆歌舞

苑

摇第二节摇唐宋词歌舞传播的表演主体

缘

一、官妓

缘

二、家妓

缘

三、市井妓

缘

摇第三节摇唐宋词歌舞传播的演唱方式

一、乐器伴奏

二、舞蹈伴唱

三、歌舞演唱

摇第四节摇唐宋词歌舞演唱的传播效果

一、声色之美的观赏性

二、交流反馈的即时性

三、传播时空的广泛性

第三章摇唐宋词的吟诵传播

摇第一节摇唐宋词吟诵传播的方式

一、赏诵

二、背诵

三、传诵

摇第二节摇唐宋词吟诵传播的特点

一、语言和非语言 双向配合

二、视觉和听觉 双管齐下

三、娱己与娱人 双双陶醉

摇第三节摇唐宋词吟诵传播的效果

一、激活情感

二、强化认同

三、自出新意

第四章摇唐宋词的手写传播

摇第一节摇唐宋词手写传播的类别

一、手写自己作品的传播

二、手写他人作品的传播

摇第二节摇唐宋词手作品的价值

一、名人崇拜

二、书艺佳品

三、文献价值

四、经济价值

摇第三节摇唐宋词手写传播的效用

一、联络感情、声气相应

- 二、授简索句、切磋词艺
- 三、干谒权贵、提高声望

词源
词源

第五章 唐宋词题壁传播

词源

第一节 唐宋词题壁传播的主要场所

词源

- 一、邮亭驿站
- 二、寺庙道观
- 三、公署私宅

词源
词源
词源

第二节 唐宋词题壁传播的主要特点

词源

- 一、便捷性,满足了人们发表作品的愿望
- 二、开放性,可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传播
- 三、竞赛性,在优胜劣汰中树立审美标准

词源
词源
词源

第三节 唐宋词题壁传播的主要内容

词源

- 一、即景抒情
- 二、实录变迁
- 三、记录心声

词源
词源
词源

第四节 唐宋词重点题壁场所举隅

词源

- 一、吴江垂虹桥
- 二、扬州大明寺
- 三、杭州丰乐楼
- 四、九江琵琶亭

词源
词源
词源
词源

第六章 唐宋词石刻传播

词源

第一节 唐宋词石刻的传播分类

词源

- 一、单体石碑
- 二、摩崖石刻

词源
词源

第二节 唐宋词石刻的传播方式

词源

- 一、自行传写
- 二、馈赠传送
- 三、拓印传卖

词源
词源
词源

第三节 唐宋词石刻的传播价值

词源

- 一、提供范本,传之久远
- 二、大量模打,广泛传播

词源
词源

- 三、考辨真伪,辑佚补遗
- 四、传真临摹,观赏书艺

图图
图近

第七章摇唐宋词的印刷传播

图图

第一节摇唐宋词印刷传播渠道的多样化

图猿

- 一、官刻
- 二、私刻
- 三、坊刻

图源
图愿
图景

第二节摇唐宋词印刷出版形式的多样性

图近

- 一、别集传播之一 单刻
- 二、别集传播之二 全集
- 三、总集传播之一 丛刻
- 四、总集传播之二 选本
- 五、笔记、诗话、词话

图近
图苑
图源
图缘
图愿

第三节摇唐宋词印刷书籍流通的便利性

图苑

- 一、书肆买卖
- 二、师友馈赠
- 三、藏书租借

图景
图缘
图近

第八章摇传播方式的演变对唐宋词的影响

图图

第一节摇歌舞传播方式与唐宋词体性形成之关系

图图

- 一、“硬件”词调、分片、押韵
- 二、“软件”传播者、传播媒介、接受者

图图
图猿

第二节摇文学与音乐的矛盾斗争和唐宋词传播方式的改变

图缘

- 一、“词乐合一”和“词乐分离”
- 二、苏轼等人的创作实践使“词乐合一”走向“词乐分离”

图缘
图苑

第三节摇唐宋词的“雅化”和传播方式演进之关系

图图

- 一、口语与书面语
- 二、手写和印刷

图图
图图

主要参考书目

图近

后记

图图

序

杨海明

唐宋词的研究目前似已成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然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唐宋词展开全面审视和细致考察的著作，至今却尚不太多。而若深加探究，则唐宋词之所以能在当时“红”极一时，以及它之所以会形成与诗文异貌的独特风情，实与其多样而又特殊的传播方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唐宋词在登上文坛之初便获得雅、俗两大群体受众的青睐与喝彩，就与其“歌舞传播”的传播方式大有关联。对此，我曾在拙著《唐宋词美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和其他文体的‘出场’不同，词的登上文学舞台和走入（唐宋人的）生活圈子，是伴随着特殊的‘声光效应’的。具体来说，它就是在音乐（燕乐）和美女（歌妓）的簇拥下登坛的。音乐给人以听觉（声）的快感，美女又给人以视觉（色相、光彩）的愉悦。因此，词所展示的文学景观和所提供的审美感受，就远比诗文所展示的文学景观和所提供的审美感受来得丰富和赏心悦目（耳）。”（《唐宋词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第 151 页）此话虽然主要论析了唐宋词所赖以诞生的文化场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它之所以能“走红”以及能产生独特魅力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其拥有的“歌舞传播”方式。由此看来，从传播学的视角来剖析唐宋词的兴盛原因及创作机制，乃是一件很有学术意义的工作。

本书的作者钱锡生博士早在从我攻读唐宋词学的硕士学位期间，就曾在《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过研究吴文英生平及词作的学术论文。嗣后的十余年来，他转行从事新闻传媒及影视创作方面的工作，在该领域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其担任总

制片主持制作的描绘苏州古典园林的电视艺术片《苏园六纪》，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星光奖”一等奖，受到影视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因~~1984年秋天开始，他又返身攻读唐宋词专业的博士学位。因而，他之撰写以《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为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亦即本书的蓝本），应该说是具有跨学科的学术优势的。在本书中，他将唐宋词大致划分为“乐人之词”、“诗人之词”和“词人之词”这三个阶段，以之与词的“声音传播”、“文字传播”和“印刷传播”相对应。全书不但重点研究了词的歌舞传播，以之彰显了词的特殊文体特性和独具的艺术风神；又详尽地论析了词的吟诵传播、手写传播、题壁传播、石刻传播及印刷传播，以之揭示了词与诗在传播方式上的异同及词因之而走向“诗化”和“雅化”的趋势。全文搜罗的资料相当丰富，而其观点也多有新意。因之，本书的出版，定将有益于词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当然，由于作者早已“改行”成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和教学者，所以本书中对某些问题的论述（主要是词的传播方式对词体、词风的影响）还显得不够充分，对此我很希望他能在今后抽空给予补足，以使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实。

~~因~~1985年 愿月 愿日

导摇摇头论

长期以来,人们对唐宋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家生平、作品文本和词风流派、审美特征等方面,而较少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而唐宋词之所以能穿透历史的烟云,代代相传,历久而弥新,恰恰是依靠了传播的力量。“传播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必需的、无所不在的活动。”^①只有通过对唐宋词传播的研究,将其放在说明其价值、意义的时空网络中,才能对唐宋词体性的形成、词风的演变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因此,对唐宋词的传播进行研究是一件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的工作。

可喜的是,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专家开始关注到这一方面,古代文学包括唐宋词的传播,已作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被纳入人们的研究视野。这类研究成果比较多的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其中有王兆鹏的《宋文学书面传播方式初探》(《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宋词的口头传播方式初探》(《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的思考》(《文学遗产》1999年第1期)、《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江汉论坛》1999年第1期)、《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等;内山精也的《苏轼文学与传播媒介》(《新宋学》第一辑)、陈岳芬的《传播媒介的变化对宋词创作的影响》(《汕头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暨南学报》1999年第1期)、《中国古典文学传播历程简述》(《汕头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曹萌的《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刘光裕、郭术兵的《论传播方式的改变对唐宋词的影响》

① 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

(《齐鲁学刊》1997年第1期)朱惠国的《论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等。此外,也有以书籍形式出现的比较宏观的研究成果,有《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孙旭培主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周月亮著,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李彬著,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宋莉华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他们的研究,有的深入细致,有的高屋建瓴,已初步建立起了古代文化和文学传播的框架。特别是王兆鹏先生,在这一方面下的工夫最深,他把唐宋文学的传播方式,分成口头传播和书面传播两大类型。其中,不同类型的传播,方式又多种多样。他还从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六个重要环节进行系统的研究。这些成果都给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启示。内山精也则抓住苏轼这一人物个案,从文学与传播媒介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苏轼作品的影响力,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宋莉华虽然研究的是明清小说,然其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结构,也给笔者提供了一种参照。但是总起来看,集中专力从唐宋词与传播方式关系的角度来进行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同时,传播学虽然是当代显学,但其理论成果主要由国外传入,如何在与本土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而不是生硬地照搬和套用,还有待于在实践中摸索。这些就成了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研究的方向目标。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文化活动向来是与传播技术不可分离的。”^①唐宋词传播方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还原唐宋词的历史本真面目;二是系统地梳理唐宋词传播方式本身的演变;三是研究传播方式对唐宋词体性的形成、词史的进程和词风的演变所起的作用。按照这样的思路,本书将分成八大部分,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 唐宋词的传播背景和传播阶段。唐宋词的传播背景是唐宋词传播研究的基础,其传播背景一是城市化,这为唐宋词的欣赏提

① 陈卫星《传播的观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供了庞大的受众群；二是商业化，这为唐宋词的消费提供了适宜的温床；三是“去道德化”，这为唐宋词的创作摆脱了精神的束缚。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唐宋词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乐人之词”、“诗人之词”和“词人之词”，它们分别和词的声音传播、文字传播和印刷传播密切结合。

第二章 唐宋词的歌舞传播。唐宋词的歌舞传播方式对唐宋词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初步确立了唐宋词的主体风格，增加了唐宋词的艺术魅力，扩大了唐宋词的社会影响。本章首先考察唐宋词歌舞传播的主要场所，其次考察唐宋词歌舞传播的表演主体，三则考察了唐宋词歌舞传播的演唱方式，四是简要分析了唐宋词歌舞演唱的传播效果。通过对各种材料的排比组合和详细分析，还原了唐宋词歌舞传播的艺术时空。

第三章 唐宋词的吟诵传播。吟诵传播和歌舞传播一样，都是声音传播，吟诵传播虽然没有歌舞传播那样迷人的魅力，但却有简捷、方便、通俗化的特点。唐宋词起初主要靠歌唱，但也不排斥吟诵，后来在词乐失传后，其声音传播便主要靠吟诵。吟诵既是一种欣赏方式，也是一种传播方式，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情趣盎然的艺术生活。本章首先论述唐宋词吟诵传播的方式，其次论述唐宋词吟诵传播的特点，再次则论述唐宋词吟诵传播的效果。

第四章 唐宋词的手写传播。手写传播是最古老的传播方式，虽然唐五代以来印刷书籍开始兴起，但手写传播却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这和人们的文化观念和物质条件有关。手写作品作为最原始的创作材料，有其特殊的作用。本章首先论述唐宋词手写传播的类别，其次研究唐宋词手写作品的价值，最后探索唐宋词手写作品的传播效用。

第五章 唐宋词的题壁传播。无处不在的各类墙壁给唐宋词人们提供了天然的、方便的创作实践机会，满足了他们发表作品的欲望，并扩大了词作的社会影响。题壁也给一般读者提供了观摩学习和欣赏评论其词作的空间，这是唐宋词繁荣的又一群众基础。本章首先考察唐宋词题壁传播的主要场所，其次探索唐宋词题壁传播的主要特点，再次分析唐宋词题壁传播的主要内容，最后对唐宋词题壁的重要场所进

行举例说明。

第六章 唐宋词的石刻传播。石刻可以传之久远,有很强的生命力。石刻还作为印刷的前身,能大量复制,使作品得到迅速而及时的传播,故受到了唐宋词人的青睐,他们善于利用石刻这一重要媒介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本章首先论述唐宋词石刻的传播分类,其次论述唐宋词石刻的传播方式,再次研究唐宋词石刻的传播价值。

第七章 唐宋词的印刷传播。唐宋词从一开始就几乎与印刷术的发展齐头并进,两者结合后,唐宋词如虎添翼,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本章首先论述唐宋词印刷传播渠道的多样化,其次论述唐宋词印刷出版形式的多样性,最后论述唐宋词印刷书籍流通的便利性。唐宋词发展到南宋时期,随着词学地位的提高,印刷词集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词的印刷传播也逐渐成为唐宋词的主导传播方式。

第八章 传播方式的演变对唐宋词的影响。唐宋词的创作和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本章论述了唐宋词传播方式对唐宋词创作所起到的推动作用。首先论述歌舞传播方式与唐宋词体性形成之关系,其次论述唐宋词音乐与文学的矛盾斗争和唐宋词传播方式的改变之关系,最后论述唐宋词的‘雅化’和传播方式演进之关系。

本书研究的主要方法：

一是采取史料收集整理传统研究方法,将研究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通过对各类材料的合理分类、归纳总结,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提供客观、具体、翔实的唐宋词传播的真实图景,避免主观武断,增强论述的科学性。

二是吸纳传播学的有关理论,借助传播学的研究手段开拓唐宋词研究的新领域,做到文献资料和理性分析相结合。在这一方面,笔者曾长期从事过传媒工作,但并不希望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理论,而是恰如其分地借鉴。

三是将唐宋词传播与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除了和史学结合外,还与印刷史、书法史、目录学、金石学、歌舞艺术、吟诵艺术等进行多方联系。当然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相当分散,要把它们收集整理、贯穿应用,非常不易。本文在这方面尽了不少的努力。

四是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进行研究。本书既要对唐宋

词的传播作宏观描述,又要对各种传播过程作微观分析,力图做到大小结合,既大处着眼,又小中见大;既全面概括,又具体生动。

综上所述,本书力图对唐宋词与传播的关系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努力探索不同的传播手段在唐宋词的词风形成与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论述不可能是面面俱到的,而只能是选取各自具有代表性的特点进行论述,希望通过这项研究,在唐宋词和传播的学科交叉点上寻找到一个新的突破口。

第摇一摇章

唐宋词的传播背景 和传播阶段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唐宋词的兴盛是与唐宋时代都市的繁荣和文
化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宋代有五部城市风俗志《东京梦华录》、
《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还有一幅长
卷形式的画作《清明上河图》,都是描绘宋代城市面貌和繁荣景象的。
打开这些城市风俗志和画卷,我们就仿佛走进当时喧闹的街市、热闹
的人群、鳞次栉比的商家店铺、市声喧嚣的茶馆酒楼,在这里可以看到
街道纵横交错、平坦宽敞,人物衣冠鲜美、表情生动,游艺场所人群汇
聚、声音嘈杂,而到处飘扬的招牌提示着处处进行的消费活动,充分显
示了城市生活的富庶和诱惑,唐宋词的繁荣就建立在这样的物质基
础上。

第一节摇唐宋词的传播背景

一、城市化为唐宋词的欣赏提供了庞大的受众群

景城城镇的发展与交通的便利

唐宋时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了新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唐代
长安、北宋汴京、南宋临安等京城,甚至比明清之际的江南大城人口更
多、更具都会性。”^①不仅是这些首会城市,其他一些镇区也发展很快,

① 王正化《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见李孝悌编《中国的城
市生活》,新星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5 页。

唐代“几个镇的中心已发展成大城市。其中较重要的为长江中游的成都、江陵以及扬州、广州和汴州。……这些商业繁荣和行业俱全的大城市成了地区中心，小城镇和地方集市网络在它们的郊区发展起来。”^①

到了宋代，城市的工商业发展更进一筹。一是打破了从唐代开始坊市制的格局，坊是百官市民聚居的场所，市是商贾百工聚居的地方，都有专门的场所，坊市必须按时用钟鼓开放和关闭，以维护治安，所谓“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②。而在宋代，街上到处开设店铺，坊市制被逐渐打破，宋神宗年间，已是“两纪以来，不闻金鼓之声”^③。二是打破了城郭的限制，原来在城市周边，有不少被称为草市的临时贸易场所，宋代以后在这里也设立了很多店铺，成为新的固定贸易场所，变成城市的外厢，使城市面积有了大规模扩展。

北宋时汴京（今开封）作为都城，“为万国之要会，升平日久，比屋富庶，四海内外宝货所聚，有闾阖之喧所不及处，已不可多得”^④。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长卷形式纪实描写汴京都城一日所见，图中官府衙门、民居宅院、作坊店铺、茶肆酒楼等屋宇错落，应有尽有，街上车水马龙，人流物流，川流不息，喧闹非凡，从中可见其工商业的繁华、交通的发达和民俗活动的丰富多彩。

杭州作为南宋的京城，“南渡以来，杭为行都二百余年，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⑤。作为一个具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其人口密度很高，商店遍布全城，百货云集，人流不息，食品丰富，生活方便：“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每日清晨，两街巷门，浮铺上行，百市买卖，热闹至饭前，市罢而收。盖杭城乃四方辐辏之地，即与外郡不同。所以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

① 崔瑞德编《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40 页。

②③ 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2 页。

④ 宋杨杰《无为集》卷十四，《四库全书》本。

⑤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8 页。

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①营业时间往往通宵达旦：“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又开店矣。”^②

宋朝除了汴京、杭州外，其他城市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如陆游说：“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③而被陆游贬为次要的扬州其实也是“雄富冠天下”，时有“扬一益二”之称。苏州则是“万井千间富庶，雄压十三州。触处青蛾画舸，红粉朱楼”（柳永〔瑞鹧鸪〕）^④。鄂州（今武汉）在陆游的笔下，则是“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建康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也”^⑤。这些城市中车船运输甚为便捷，陆路上轿车、马车络绎不绝，“自南渡后至今，则无人不坐轿焉”^⑥。“京师承平时，宗室戚里时入禁中，妇女上犊车，皆用两小鬟，持香球在旁，而袖中又自持两小香球，车驰过，香烟如云，数里不绝，尘土皆香。”^⑦水路更是便捷，如江浙一带“盖水路皆便，多用船只”，“江岸之船甚夥，初非一色：海舶、大舰、网艇、大小船支、公私浙江渔捕等渡船、买卖客舟”^⑧等不一而足，且速度也很快，如杭州西湖内“船棚上无人撑驾，但用车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⑨。一些重要的城市，如杭州、苏州、南京、扬州等几乎连成了一片，四通八达的交通，使人们出行极为方便：“若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佃船，舫船、航船、飞蓬船等。”^⑩“四时游玩，大小

①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4 页。

②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4 页。

③ 陆游《会稽志序》，《陆游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09 页。

④ 柳永〔瑞鹧鸪〕，《全宋词》，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24 页。

⑤ 陆游《入蜀记》，《陆游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09 页。

⑥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八，四库全书本。

⑦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44 页。

⑧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1 页。

⑨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1 页。

⑩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1 页。

船支，雇价无虚日。”^①“舟中所须器物，一一毕备。但朝出登舟而饮，暮则径归，不劳余力，惟支费钱耳。”^②唐宋时期的交通线路已很完备，方豪在其《宋史》中称“唐代交通干线，依三十里一驿，一千六百三十九驿计之，全国当时有驿路四万九千一百七十里。”^③陈振在其《宋史》中称：“宋代各州、县之间都有官路相通，官路也称官道。通驿传的官路也称驿路、大路，通常大多数官路即是驿路，主干线常称为大驿路、大路。最著名的大驿路，如‘入川大路，自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凤州镇）至利州（今四川广元）、剑门关（今四川剑阁北）直入益州路’。通常自首都到各路（类似后来的省）首府，都有大驿路相通，以便于快速传递文件。”^④这些发达的交通线路，将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

圆媛人口的集中与市民阶层的崛起

由于城市的大规模发展，人口不断涌入，除了王公贵戚、达官贵人、富商巨贾外，大部分的人都是平民士兵。宋太宗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⑤。光是官营的制造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南北作坊，其中南作坊有“兵、校及匠三千七百四十一人”，北作坊有“兵、校及匠四千一百九十人”。一般的平民百姓就更多了，“到北宋前期末的天禧五年初，开封城内已有常住户近十万户，加上城外市区居民户、驻军及家属户，至少也在五万户以上，另有宫廷人口和大量流动人口，估计约有百万人口，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⑥。而《咸淳临安志》则记载杭州人口：“共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⑦《西湖老人繁胜录》称城内外有百万人家。因为人口增加，给人的感觉是到处是人，如杭州“西湖内画船布满，头尾相接，有若浮

①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二，《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圆媛年 版，第 圆媛 页。

② 耐得翁《都城纪胜》，《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圆媛年 版，第 圆媛 页。

③ 方豪《宋史》，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圆媛年 版，第 圆媛 页。

④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圆媛年 版，第 圆媛 页。

⑤ 脱脱等《宋史》卷九十三，中华书局 圆媛年 版，第 圆媛 页。

⑥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圆媛年 版，第 圆媛 页。

⑦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八，《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圆媛年 版，第 圆媛 页。

桥。”岸上游人，店舍盈满。路边搭盖浮棚，卖酒食也无坐处，又于赏茶处借坐饮酒。南北高峰诸山寺院僧堂佛殿，游人俱满。”^①“都人士女，两堤骈集，几于无置足地。水面画楫，栉比如鱼鳞，亦无行舟之路。”^②由于城市广大、人烟浩穰，所以竟至“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③。

除了汴京，北宋时“各地较大的城市，主要是各路尤其是东南和川西北诸路首府，……成都府路的成都，有二十五万多人；人口在二十万上下的各路首府，依次是梓州路的梓州、京西南路的襄州、利州路的兴元府、江南东路的江宁、淮南东路的扬州。”^④而南宋时，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在南方“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⑤。

随着人口的增加，必须保证各种生活和生产物资的供应，而从事这一工作的劳动者也越来越多，形成了庞大的市民阶层。他们各有自己的组织“行”，隋唐时约有一百十二行，到宋代时已发展到四百十四行。如吴自牧在《梦粱录》中云：“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⑥

这些行中，有手工行，如“修内司、八作司、广固作坊、后花作坊、书艺局、绫锦院、文绣院、内酒坊、法酒库”等^⑦，城市中大量的日用品，都是由手工作坊生产。

有商业行，宋代商业非常发达，其组织很严密，分布很合理。北宋宫城“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盖禁中买卖在此，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⑧。“东去乃潘楼街，

① 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50 页。

② 周密《武林旧事》卷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0 页。

③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7 页。

④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7 页。

⑤ 庄绰《鸡肋编》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40 页。

⑥ 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0 页。

⑦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4 页。

⑧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04 页。